

中学语文 课文作者谈课文

(高中部分)

宋瑞兰 袁裴编

广西师范大学中文系

中学语文课文作者 谈 课 文

(高中部分)

宋瑞兰 袁裴 编

广西师范大学中文系

目 录

关于《长江三日》的一封信	刘白羽	(1)
我和《雨中登泰山》	李健吾	(2)
关于《雨中登泰山》的两封信	李健吾	(5)
《荔枝在开封绝对不能越冬》	贾祖璋	(8)
关于《现代自然科学中的基础学科》 教学答疑	钱学森	(15)
《包身工》余话	夏衍	(17)
夏衍谈《包身工》	魏浩	(28)
《为了周总理的嘱托》发表前后	穆青	(32)
关于《路标》	魏巍	(35)
谈《药》	鲁迅	(36)
我写《百合花》的经过	茹志鹃	(38)
关于《土地》的通信	秦牧	(45)
谈《秋色赋》的写作	峻青	(47)
关于《秋色赋》的通信	峻青	(53)
我是怎样写《一月的哀思》的	李瑛	(54)
关于《一月的哀思》几则答问	李瑛	(77)
谈《祝福》	鲁迅	(87)
关于《荷花淀》的写作	孙犁	(87)
——应教学参考之用		
《天山景物记》的写作经过	碧野	(91)
关于《天山景物记》的几点释疑	碧野	(99)

关于《云赋》	孙 苏(102)
我是怎样写《杨树》一文的	杨鉴普(106)
关于《杨树》一文的来信	杨鉴普(109)
谈《为了忘却的纪念》	鲁 迅(111)
关于《琐忆》	唐 疊(113)
唐弢同志谈《琐忆》	鲁宝元(116)
从我写的两篇课文谈起	郑文光(122)
谈《阿Q正传》	鲁 迅(123)
壮美·优美——谈《虎吼雷鸣马萧萧》	姚雪垠(125)
关于《花城》质疑的答复	秦 牧(128)
关于一篇语文教材的通信	马识途(132)
谈《狂人日记》	鲁 迅(138)
谈《呐喊·自序》	鲁 迅(139)
关于《雷雨》	曹 禺(141)
简谈《雷雨》	曹 禺(145)
谈《范爱农》	鲁 迅(148)
关于《春鸟》	臧克家(149)
关于《语言的演变》的通信	吕叔湘(150)
巴金谈《灯》	范守纲(153)
关于《菱角》的通信	秦 牧(156)
谈《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	鲁 迅(157)
关于《大堰河——我的保姆》的通信	艾 青(158)
谈《春蚕》的写作	茅 盾(160)
题外的话——谈《结婚现场会》的创作	马 烽(163)
关于《打开知识宝库的钥匙——书目》	陈天宏(166)

关于《长江三日》的一封信

《光明日报》编辑部：

这是我给一些中学教师的信，但我无法一一函叙，请你们给一点地方发表，因为我的散文《长江三日》被选入一些中学教科书，其中有两处必须讲清，否则教师不好讲课。

(一) 文中引了德国无产阶级革命家罗莎·卢森堡《狱中书简》一段话，那里面讲到“佛龙克”，由于未加注解，不少同志来信讯问，佛龙克是德国一个地名，卢森堡被捕后一度关押在佛龙克狱中。

(二) 湖北省一位教师同志来信，指出我写道“秭归是屈原故乡，是楚王子熊泽建国之地”，“熊泽”应是“熊绎”，袁崧《宜都山川记》云“秭归盖楚子熊绎之始国而屈原之乡里也”，既云建国，就不应是楚王子，因此“楚王子”应是“楚子”（是熊绎的封爵），这是我理解的错误。《长江三日》文中那句话应该是“秭归是屈原故乡，是楚子熊绎建国之地”。

既已选入教科书，合应更正。我对来信同志非常感谢，感谢你们纠正了我的疏忽和错误。

敬礼！

刘白羽

我和《雨中登泰山》

· 李健吾 ·

去泰山是我和我的儿子一道去的。我们在兗州下了火车，带着文学研究所的介绍信，以及其他文件（如中国戏剧家协会理事会的会员证），先去领导机关说明情况，该机关派了一辆小汽车把我们送到曲阜，由一位副县长热情招待。后来我写了一篇游记，发表在1961年10月的《山东文学》上。我们的本意是去泰山，不料阴雨连绵，一直下了三天，偶尔不下雨，便在曲阜看了个够。可是雨好象单单和我们为难似的，还是那位副县长（我忘了他的姓名，实在不应该）好客，用丰盛的菜饭款待了我们三天。到第四天，雨还是下个不停，我们再也耐不住了，只得向他告别。他也叹了口气，说真糟糕，留不住我们，只得写了一封介绍信，派车把我们送到兗州车站。我们父子就这样去了泰安县。

我的本意是去泰山的。为什么？文章里我已经交代清楚了。《人民日报》的文艺版编辑姜德明同志是知道的，约我回来给《人民日报》写一篇游记发表。我们到了泰安，由教育局安排一位张同志（我忘了他的名字，我的记性实在不好！）陪我们上泰山，约定了第二天上午七时在我们住的地方会齐。可是第二天一早，雨又下个不停，眼看十一点半了，似乎有放晴的意思，我说：“走吧！”我们就这样鼓起勇气，上了泰山。

登泰山不足为奇，妙就妙在雨中。因为我们才到泰

山，有时细雨蒙蒙，有时倾盆而下，一直收煞不住。

“雨”对游客来说，本来是一件坏事，不过这次出于我们的意外，反而做成我们这次登上的乐趣。寻常上山，有日晒，而无雨淋，是乐趣，也是苦趣。试想一座干秃秃的枯山，就说有意思，也比不上“雨中”登泰山的意味无穷。

文章的主题思想就在写“雨”与泰山的关系。

我多年不回家乡了，今年元旦我回去了一趟，翻过中条山，去了芮城一趟。遗憾的是，我童年的梦破灭了，现实生活告诉我，这座山是光秃秃的，很少有几棵树。记得我在中学时期写过一篇《终条山的传说》（1924年12月，《晨报》副刊），鲁迅先生在《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谬奖，说：“《终条山的传说》是绚烂了，虽在十年以后的今日，还可以看见那藏在用口碑织就的华服里面的身体和灵魂。”其实什么“传说”也不该在中条山有，山太枯了。

所以1961年7月，“雨”中登泰山，显得别有意味。

这篇文章我从自然顺序写起，从下面写到顶点——南天门。为了衬托山高势险，我写自己如何胆怯力弱，又从游人中特意挑出了一位老大爷“斜着脚步，穿花一般，侧着身子，赶到我们前头”。还挑了一位老大娘，“挎着香袋，尽管脚小，也稳稳当当，从我们身边过去”。这就是我上“紧十八盘”的心情。“小脚”，是裹过的“小脚”。这对我是一种鞭策，一种鼓励。对读者，在困难中，也是一种鞭策，一种鼓励。在这种挣扎中，天快黑了，我不得不奋力，终于上到了泰山之巅，“而小天下”！

回到北京，文章被《人民文学》先下手为强，拿去发

表了，我到现在还觉得对不起姜德明同志，因为我失了约。

文章里有“涤河”，读者查不到出处，其实它是汶河一个支流，是从泰山往西南流出的。我有一本乾隆年间“雨山堂”出版的《泰山道里记》，上面写得明白：

“《泰山小史》云：‘泉出一天门下一里，水西南流，迨宋创此城，疏泉缭绕其下，城北旧有水道，经岱偏东南出，折而西南，曰运舟街，至城西南出，会涤河入泮归汶’”。

《泰山小史》是明朝的书，可能山东省图书馆还有。

“涤”读音应如“奈”。《康熙字典》与《辞海》均无此字。

《雨中登泰山》回避了一些事实。例如年轻男女烧香磕头，求子求福。我们这次去还忙坏了山上的招待所，因为山下虽有电话给它，而我们到时，已经快八点了，它特意为我们准备了干衣裤，和干净的棉被，后来日出虽未看到，它却为我们准备好了观日出的棉大衣。这些都是值得感谢的。第二天下午我们下山，天晴了，瀑布小了，几乎看不清楚了。所以“雨”中登泰山，还是值得的。

1982年8月29日

李健吾关于《雨中登泰山》 的两封信

《语文学习》编者按：为了研究新教材《雨中登泰山》的有关问题，上海市普陀中学教师汪正煜同志最近曾两次致信作家李健吾同志。现将李健吾同志的复信发表于后，供教学参考。

信中提到的对《雨中登泰山》的四处更正，高中语文课文第一册除已将“峻嶒”改为“崚嶒”之外，其余三处尚未更改。“斗母宫”见课本第23页倒数第2行；“瑰奇”见第17页倒数第6行；“第一次的‘南天门’”见第18页倒数第6行。

汪正煜同志的信（摘录）

（一）

《雨中登泰山》原文第四段写到：“雨大起来了，我们拐进王母庙后的七真祠。”而文章结束处说：“倾盆大雨时，恰好又在斗母宫躲过。”这样，避雨的地点就有两处。上海辞书出版社新出版的《中国名胜词典》618页至619页介绍：王母庙后的七真祠在岱宗坊北，与虎山水库隔溪相望；而斗母宫在王母庙以北、经石峪西南一公里的登山盘道东侧。显见两处确非一地。

那么，是否在两处都避过雨呢？从文章记述层次看，七真祠避雨后，也不会重遇“倾盆大雨”，并“在斗母宫

躲过”。

尊作在《人民文学》一九六一年十一月号刊载后，曾被选入散文专集。但各散文集中均未对此更改过。直至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9月版的《现代游记选》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8月版的《散文特写选（二）》，也是照录了原文。

这样，使我很自然产生了疑问：究竟是原著别有深意，还是笔误所致呢？“王母庙”俗称“王母宫”，会不会因一字之误在文末写成“斗母宫”了呢？

(二)

另外，尚有两处不甚了了。您说，“第一次的南天门应为一天门”。查阅原文，凡写到“南天门”的，似无需要更改处。不知您是指哪一句？祈能指明。“峻嶒”的“崚”，据说新课本并未印错，可能您查的那本散文集印错了，望能相告所本，以便查正勘误。

(一)

汪正煜同志：

谢谢你的来信。

“斗母宫”应是“王母庙”之误。“瑰奇”应做“瑰丽”。第一次的“南天门”应是“一天门”。“峻嶒”应是“崚嶒”。请予付印时一律加以改正。

此致

敬礼！

李健吾

1982年6月28日

(二)

正煜同志：

接到来信，催我答复。我因后面书房尚未完工，方才寻找，勉强找到《泰山道里记》一本老书，是乾隆的书，其上有图可寻，唯名称稍有变更。其中南天门确为“一天门”，“孔子登临处”，即在其旁。“中天门”即《道里记》中所谓“二天门”，可以不改。“南天门”即《道里记》中所谓“三天门”。《记》中通称为“南天门”。《道里记》中“自序”说，其中有一地两称或名同地异”，盖自古亦然。“一天门”书中又称“红门”。我根据的版本是北京出版社1963年的旧版。此书现在宁夏人民出版社，因为它要我的散文集。我抄了一份，打算寄往四川人民出版社，因为后者要我的三本选集。

我因杂务多，回信略迟。请谅。如更正，第一次所见之“南天门”请改为“一天门”或古人所谓“红门”。“峻嶒”请改为“崚嶒”即可。

有关教学方面的事，你就饶过我吧，手头事甚多，既忙，亦不敢献丑也。

此致

敬礼！

李健吾

1982年7月16日

课文作者辩难答疑两篇

《中学文科教学参考资料》编者按：河南胡昭著、罗淑珍二同志给本刊来稿，对《南州六月荔枝丹》一文提出商榷。我们将文章转给《南》文作者贾祖璋同志，请他谈谈自己的见解，贾祖璋同志即寄来辨释文章。又，广西梁宝球同志就《现代自然科学中的基础学科》一文教学中遇到的问题，致函作者钱学森同志，钱学森同志复函答疑后，梁宝球同志即将两函转来本刊。我们认为，这些文章和信函对于教师们上好这两篇课文很有参考价值，特发表在此，同时将胡、罗的文章和梁的信件一并发表，供读者参考。

荔枝在开封绝对不能越冬

贾祖璋

胡罗二同志大作，发扬争鸣精神，深为钦佩。拜读过后，从事实出发，谨述鄙见如次。

先讲“壳如红缯”。拙作引用这句话，进而讲荔枝壳的色泽和表面构造，是要让读后对荔枝发生兴趣，并从文学欣赏进而作科学的观察。“壳如红缯”是比喻的说法，比喻不论怎样切近，与实际总会相隔一层。所以即使有胜江萍那一类壳比较光的品种，也不能用丝织品来表现它的神韵。

但说这是对白居易的批评不免重了一些（包括假种皮和壳内壁花纹两项）。我们不能要求古人掌握现代的科学知识。对它们所说的可加以补充和解释，却不必批评。

宋徽宗栽种荔枝一事，依据常识判断，只是“当年成熟一次”，也就是说当年冬季难免冻死，应无错误。我们知道，荔枝只能短时期经受零下二、三度的低温，而开封的冬季是长期在这个温度以下的，要它出现不冻死的奇迹，决不可能。

拙作引用《三山志》“以小株结实者，置瓦器中，航海至阙下（开封），移植宣和殿”，应是实情。既可以“移植宣和殿”，当然也可以移植“保和殿”或“艮岳”。今年死了，明年再种，徽宗尽有这样的便利。至于“密移造化闽山，禁御新栽荔枝丹”这两句诗，从它单纯突出栽种成功这一点来说是“吹嘘”，但使用“新栽”字样，叙明整个移植过程，倒是属实。陆游等人的记载，只是记录传闻罢了。

张湜（hào）《艮岳记》主要内容是宋徽宗御制《艮岳记》和祖秀《毕阳宫记》的节略，关于荔枝也是徽宗自己说的。蔡湜说艮岳还有椰实，那比荔枝更不耐寒，更可以判定它不能多年生存。而且椰实要经过一年才能成熟，不是整株树新从南方运来，树上哪里会有可以剖食的椰实。这又帮助说明，八十多株荔枝，一定全部是“新栽”的树。

《艮岳记》里，张湜说：“金人入阙，大雪盈尺，（注意这年大雪盈尺，往年怎样？）诏令民任便砍伐为薪”。祖秀说：“靖康元年闰十一月，大梁陷，都人相与

排墙避虏于寿山艮岳之巅。时大雪新霁……祖秀周览累日……明年春，复游华阳宫，而民废之矣。”两人都没有说被砍伐的是什么树木，胡罗二同志说：“荔枝和其他花木一起遭了劫”，特别指出荔枝，似无根据。

已故著名科学家竺可桢，在《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一文中说：“福州是中国东海岸生长荔枝的北限。一千多年来，曾有两次全部死亡，一次在公元1110年，另一次在公元1178年，均在十二世纪”。（参阅拙作《宋家王古荔枝树》，《科学与文化》1981年第四期）公元1110年就是徽宗大观四年。这是一个很好的旁证，荔枝当时在原产地也会冻死，在大雪盈尺的开封，怎能安全越冬？

文征明《新荔篇》原本有一篇序：“常熟顾氏自闽中移荔枝数本，经岁遂活。石田使析枝验之，翠叶芃芃，然不敢信也。以示闽人，良是，因作《新荔篇》，命壁同赋”。由于文章不能写得过长，拙作没有提起这篇序文，也没有引录“还闻累累生数子”那几句诗。其实“从此江乡亦萌蘖”这一句，已说明它不是当年新栽的树。不过荔枝能在江苏活过一冬，是很偶然的，可能刚巧那年天气比较温暖，而且这几株荔枝已经活过一冬，又结了“子”，并不保证它们象在原产地那样就可以长久存活下去。“究竟活了多少年？”还是可以问的。问了也没有否定它们已经活到第二年而且结了果。

“并无下文”，是说文征明或其他人以后不再提起这几株荔枝。如果第三年、第四年……它们能够继续“累累生数子”，作为文征明，应该有机会，不再作流涎的百

客，而得以“忽落馋夫齿”吧，为什么不再写诗赞颂呢？那位顾氏主人难道竟不知文征明大名，不知摘下鲜果去酬谢他一下吗？如此说来，不妨推定，这几株荔枝，到第三年，不是死去，便是不再结果。我们不必希望荔枝会有傲霜斗雪的精神。

象广西那样温暖的地方，也未能全区都生长荔枝，那末有什么理由，可以相信，古代的河南和江苏，荔枝竟能生存多年？史料宜加鉴别，就是要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对古人不要妄加批评，也不必盲目相信。

附：

和《南州六月荔枝丹》作者商榷

胡昭著 罗淑珍

《南州六月荔枝丹》（以下简称《南》）一文，以通俗生动的笔调向广大读者介绍了荔枝，使读者增长了知识。特别是作者巧妙地引用了很多古诗文，给文章增色不少；又引用了大量科学研究新成果，增强了文章的准确性和科学性。这一些，作为科普作品都是应予肯定的。

但是，有几处考证和引文似有值得商榷之处。我们冒昧地提出来就教于大家。

《南》文肯定了白居易《荔枝图序》的一些优点，也指出了它的一些不足。这些批评绝大部分是恰当的。如白居易把假种皮称作果肉的非科学观点，把壳内壁花纹错认作膜的花纹的误会。只是贾祖璋同志批评白居易用“红

“缯”比喻荔枝外壳不恰当的说法，我们却不能赞同。

作者批评白居易的理由是：“缯是丝织物，丝织物滑润，荔枝壳却是粗糙的”。我们认为，如果认真考究一下“缯”的本义和荔枝的品种，就不难发现作者的批评才是不恰当的。

在《说文》中，是用“缯”“帛”互训的，但在《辞源》、《辞海》、《国语辞典》上，均一致注明“缯”为丝织物的总称。我们知道，丝织物有的是滑润的，但也有表面有皱纹，如双绉、碧绉、湖绉等绉纱类。如果说荔枝壳是粗糙的，白居易以缯中的绉纱作比，不也正好吗？况且，《南》文断定荔枝壳“是粗糙的”的说法，是不符合真实情况的。我们曾经查过一些有关荔枝的文献资料，发现徐渤、曹蕃的《荔枝谱》和汪灏等人的《广群芳谱》上，都共同地记有三个光壳的荔枝品种：一名胜江陈，又名胜江萍、净江瓶；一名中观，又名中冠；一名鹅卵。其他《荔枝谱》中也有注明为“皮平”的品种。由此可见，荔枝外壳只能说大部分是粗糙的。白居易当年吃的、见的、种的（他亲种过荔枝）是不是也有光壳的呢？我们无从知道。但既然“缯”不全是滑润的，而荔枝外壳又不全是粗糙的，白居易那样比喻，不正是恰如其分吗？

《南》文对宋徽宗《宣和殿荔枝》一诗加上了“徽宗吹嘘”的字眼，而且肯定只当年结实一次。我们没有看到作者下这些结论的根据，但据我们所知，徽宗种活荔枝并且开花结实，不仅是宣和殿这一次，虽然没有说明到底结实几次，但也没有材料说明只当年结实一次。陆游《老学庵笔记》和瞿佑《归田诗话》就记有保和殿种荔枝结实的

事。下面是陆游的记载：

“宣和中，保和殿种荔枝成实，徽庙手摘以赐燕帅王安中，且赐以诗曰：‘保和殿下荔枝丹，文武衣冠被百蛮。恩与廷臣同此味，红骑飞鞍过燕山’。”①

瞿佑所记跟陆游相同，只是诗中“廷臣”二字改为“近臣”。

徽宗近臣侍制蔡絛（蔡京子，常随徽宗左右）所著《铁围山丛谈》则详细记载有徽宗时的大型园林“艮岳”栽种荔枝成实的事：

“艮岳阳华门，夹道荔枝八十余株，当前榔实一株，每召儒臣游览，则一珰执荔枝簿立石亭下，内使一人宣旨，人各侍若干，于是主者乃对簿按树以分赐，朱销而奏审焉。吾一日偶赐从鲁公入，时汗共尝②榔实，一小珰登梯就摘而剖之，诸珰人荔枝二枚……”

“艮岳”是徽宗登基初年为求嗣而建的大型园林，在汴京城北隅，广数十里，后因金人围汴京时大雪不止，诏令百姓砍伐艮岳花木为柴薪，荔枝和其他花木一起遭了劫③。蔡絛（tāo）于钦宗时被处死，但《铁围山丛谈》这些记载却为我们提供了研究线索。

《南》文关于文征明《新荔篇》的引文和批评，则更有不妥之处。据《新荔篇》所记：常熟顾氏移栽的荔枝，不仅“萌蘖”了，而且开了花、结了实，还有人吃过。因此诗人感叹不已，写了此诗。诗中明确写道：

“还闻累累生数子，绛绡裹玉分明是。未论香色果何如，只说形模已珍美。千载空流百客涎，一朝忽落馋夫齿。……仙人本是海山姿，从此江山亦萌蘖。”

然而，《南》文不引开了花结了实的句子，也不说明